

学习文选

XUEXI WENXUAN

特 辑
1963

学 习 文 选

XUEXI WENXUAN

(特 輯)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1963年·武汉

学 习 文 选

1963年特輯

*

湖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新出字第1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frac{1}{32}$ · 1 $\frac{3}{4}$ 印張 · 39,000字

1963年1月第1版

1963年1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3106·271

定 价：(8) 0.17元

目 录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

.....《人民日报》编辑部(1)

(1959年5月6日)

从中印边界问题再论尼赫鲁的哲学

.....《人民日报》编辑部(25)

(1962年10月27日)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学

《人民日报》編輯部

(1959年5月6日)

西藏少数卖国贼发动的一坊叛乱战争，已经基本上平息了。叛乱分子所造成的流血冲突，随着他们的可耻的失败，在西藏绝大部分土地上停止了。现在，西藏正在面临着一次和平的革命，这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议所指出的、西藏广大人民期待已久和迫切要求的民主改革。这是一坊革命，是1949年前后席卷中国大陆的人民大革命在西藏的继续。这坊革命，在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八年中，一直因为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挠而拖延了。在叛乱平定之后接着进行的革命，将是一坊和平的革命，就是说，不流血的革命。西藏人民对于西藏的沒有参加叛乱的上层阶级将采取赎买的政策，就跟在汉族地区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差不多。因为在西藏人民的背后，有全中国已经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几亿人民的支援，有充分的条件这样做。

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舆论正在对西藏问题大谈特谈，这是一件极大的好事。这个从来不曾被人们认真注意过的世界屋脊上的一百多万人民，完全有权利享受这分光荣，让全世界注意他们，让他们在全世界的议论中得到教育，得到锻炼。有些外国人说：西藏的少数反动分子的叛乱是“革命”，是“民族主义”的、“反侵略”的、“反殖民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他们应

该获得“完全”的“不受侵犯”的自治或者“独立”；而人民解放军在藏族人民的积极支持下对于叛乱的平定，则是“武装干涉”，是“侵略”，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希特勒主义”。这样说的人是西方帝国主义者，是各国的反动派，例如亚洲的岸信介、李承晚、乃沙立、吴庭艳和蒋介石（但是他并不赞成西藏独立，而要求西藏归顺台湾）。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他们的一般政治态度同上述那些人不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却跟帝国主义站在一边，例如印度的某些资产阶级分子。所有上述的这些人，在世界上是少数，在本国也是少数，但是他们控制着相当大量的宣传机器，一时显得颇为嚣张。世界上更多的人说，西藏的叛乱是反动的，平定叛乱是正义的。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一致支持中国人民对叛乱分子的斗争。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站在中国人民方面的也占大多数。他们包括各国的劳动人民，主张正义和进步的人士，和正在反对外国侵略外国干涉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民族资产阶级懂得，赞成外国干涉西藏，就等于赞成外国干涉印度尼西亚、锡兰、柬埔寨、尼泊尔、伊拉克、古巴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内政，等于赞成侵犯这些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在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正义的声音暂时没有那批反中国的宣传机器所造成的喧声高。有些人感觉难过：好端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好端端的中印友好，如果不出西藏叛乱，岂不更好！他们的心是好的；但是，他们没有看出，西藏叛乱既然发生了，而又迅速平定了，坏事就变成了好事。西藏的革命被这次叛乱加速了，而西藏的民主化将最终结束外国干涉西藏的历史，这对于中印友好的真正巩固也是完全必要的。总之，对于这种不同议论，不但西藏人民和全中国人民应该认真研究，得到教训，而且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特别是那些对西藏问题大嚷特嚷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也将

会加以研究，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训。

我们现在想谈谈尼赫鲁先生4月27日在印度人民的讲话。(本报编辑部按：在我们写好这篇评论以后，我们读到了尼赫鲁总理5月4日在印度联邦院的讲话。这篇讲话的主要论点并没有超出4月27日讲话的范围。所以，我们没有对这篇评论作任何的修改和补充。)

尼赫鲁先生从今年3月17日到4月底，在议会讲西藏问题，这是第七次了。尼赫鲁先生曾经多次表示同情所谓“西藏人的自治愿望”，反对中国的所谓“武装干涉”。在4月27日，他讲的话比较更有系统，本报已经在4月30日全文发表过了。为了读者的方便，我们现在把他的话再引出一段，这段话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他对于西藏叛乱和印度作用的一个提要：

“情况无疑是困难的。一方面，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迅速前进的社会；而另一方面，是一个停滞不前的、没有改变的、担心可能会在改革的名义下对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社会。两者之间的距离很大，看来很难有任何会合点。与此同时，某种形式的改变不可避免地来到了西藏。交通迅速地发展了，西藏长期的与世隔绝的状态部分地被冲破了。虽然物质上的障碍逐步消除了，可是心理上和感情上的障碍却增加了。显然，冲破这些心理上和感情上的障碍的尝试或者没有作，或者作了没有成功。

“如果说这完全要由西藏若干‘上层反动分子’负责，看来这种说法是把一种复杂的情况异乎寻常地简单化了。甚至根据得自中国方面的消息，西藏暴乱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这个暴乱的基础一定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影响着上层阶级的人，而且影响着其他人。毫无疑问，既得利益集团参加了暴乱，并且企图从中得利。试图用颇为陈腐的字眼、措辞和口号来解释情况，是很少有什么帮助的。

“当这些不愉快的事态发展的消息传到印度来的时候，立即引起了强烈的普遍的反应。这种反应并不是政府引起的。这种反应实质上也不是政治性的。这种反应主要是一种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它的产生也还基于同西藏人民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所造成的亲密感情。这是本能的反应。不错，印度有些人的确企图把这种反应引导到不适当的方向，而从中得利。但是，印度人民的反应却是明摆着的事实。如果这里的反应尚且如此，那么人们就不难设想西藏人自己的反应怎样了。也许亚洲的其他佛教国家也有这种反应。当这种实质上不是政治性的强烈情绪存在的时候，那是不能仅仅用政治方法来处理的，更不能用军事方法来处理了。我们一点也不想干涉西藏；我们非常希望保持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友谊；但是同时，我们非常同情西藏人民，我们对于他们的困难处境感到非常难过。我们仍然希望，中国当局会采取明智的态度，不使用他们巨大的力量来对付西藏人，而根据他们自己就西藏地区的自治作出的保证，争取他们友好合作。首先，我们希望，目前的战斗和杀戮将会终止。”

尼赫鲁所谓西藏的“停滞不前的、没有改变的、担心可能会在改革的名义下对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没有说明。但是，这正是全部问题的出发点。我们的讨论必须从这里开始，也只能从这里开始。

西藏社会是一个领主庄园制的农奴社会。在西藏，主要的生产资料——全部土地和绝大部分牲畜，都属于三种领主，也就是农奴主，即官家（封建政府）、寺院和贵族。这三种农奴主只占西藏一百二十万人口中的百分之五左右，即六万人左右。所有的农民都没有自己的土地，大部分牧民都没有自己的牲畜，只能为农奴主劳动。他们自己，连同他们的子女，世世代代，都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农奴主。农奴主的领地一部分属于专为封建政府支差的土地，被分配种这些土地的农奴要无偿地担负封建政府各种

名目的差役。兵役也由这些领地上的一部分农奴担负。其余的领地是农奴主的所谓“自营地”。在这种领地上，农奴要用自己的耕牛农具（有时还要带自己的伙食）为领主耕种全部土地，而领主只给一小块（约占领主土地的十分之三）不好的份地给农奴作为代价。农奴每年要用绝大部分时间在农奴主的土地上劳动，并且要为农奴主作各种无偿的劳役。在以上这两种领地上，农奴的劳动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成为农奴主的剥削收入。农奴的收入一般都难于维持生活，因此不能不向农奴主借高利贷。大批农奴所欠的债无法偿还，以至有已经欠了几百年的债。农奴不但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而且没有普通的行动自由，短期外出也必须由领主准假。

西藏的贵族是世袭的。全西藏现在有贵族二三百家，其地位高低看财产多少而定。大贵族约占贵族总数的十分之一，即二十几家，他们每家都有几十处庄园，成千上万个农奴。西藏封建政府的权力始终掌握在这些大贵族手中。贵族和农奴等级的界限很森严。农奴见了贵族要回避或鞠躬吐舌，表示敬畏，讲话也要有一定的讲法，不许讲错。贵族对于逃亡的农奴或者其他被认为违法的农奴，可以任意用刑，除了最通常的鞭打以外，甚至还有剜眼、割鼻、割手、割脚筋、挖膝盖骨等各种骇人听闻的酷刑。

西藏的寺院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寺院的正当宗教活动和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必须加以保护和尊重的。但是，西藏寺院的统治者，到目前为止，却都同时是农奴主。寺院在高利贷和商业方面对于农奴的剥削，比官家和贵族更苛刻。寺院对农奴还多一重以宗教名义进行的剥削。寺院内部也是等级森严，农奴出身的贫苦喇嘛和小喇嘛，在寺院中也是被剥削者。寺院内也设有各种刑具和牢狱，对于农奴和下层喇嘛可以任意处刑，其残酷的程度跟其他农奴主没有两样。

大致说来，贵族和寺院各占有全西藏土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余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属于封建政府。

建筑在这样反动的、黑暗的、残酷的、野蛮的农奴制基础上的西藏政教中枢，当然就是一小撮最大的农奴主的集合体。在这些最大的农奴主中间，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各种可怕的腐败现象和内部斗争。在达赖喇嘛周围的一部分掌握权力的高级官员中，为了争权夺利互相残杀毒毙的事件层出不穷。达赖喇嘛，并不是象尼赫鲁所说的那样，无条件地被这些人非常崇敬；相反，这些人经常把达赖喇嘛当作傀儡，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他，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甚至把达赖喇嘛本人活活害死。例如，人们知道，1855年，达赖十一世只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在布达拉宫暴亡；随后，1875年，达赖十二世又在二十岁的时候在布达拉宫暴亡。英帝国主义侵入西藏以后，西藏上层反动统治者倾軋异己的手段，也更加卑鄙和残酷了。1923年，班禅九世被迫终身逃亡内地；1947年，担任了八年摄政的热振呼图克图被逮捕并勒毙狱中；同年，现在穆索里的达赖十四世的父亲，也因为具有爱国思想，被里通外国的反动分子为了便于控制达赖喇嘛而毒死；1950年，致力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格达活佛，在昌都被毒死和焚尸灭迹。这些著名的罪行，都是西藏统治集团中外国干涉者的走狗干的。

这个社会过去确是停滞不前的，不但经济衰敝，文化落后，连人口也不能增殖。但是，这个社会的制度丝毫也不“温和”，丝毫也不“人道”！这个社会制度是一个十足的落后、反动、残酷、野蛮的制度！

试问世界上一切大吵大闹的所谓西藏人民的同情者：你们同情的“西藏人民”是谁呢？你们所宣传的西藏的自治或“独立”是谁的自治或独立呢？你们痛哭哀悼的西藏叛乱的失败是谁的失败呢？看起来，很多所谓“同情者”只是假冒西藏人民之名，假

冒西藏自治之名，假冒人道之名。他们所同情的并不是西藏人民，而是西藏人民的世世代代的压迫者、剥削者、残杀者，而是西藏的吃人制度的首脑。在西藏的大农奴主剜出农奴的眼睛和心脏来的时候，这些同情专家不觉得是悲剧，不向这些农奴主要求温和和人道。在这些大农奴主向驻守在自己国土上的人民解放军举行武力进攻的时候，在他们用野蛮的方法残杀被他们俘虏的解放军战士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的时候，同情家们只是叫“打得好”，只是鼓吹这些农奴主能够进行百年的游击战争，也不向他们要求温和和人道。而唯有在人民解放军对于这些坚持叛乱的豺狼由防御转入进攻的时候，也就是说，唯有在这个世界上最残酷最野蛮的农奴制度由于武装匪徒叛乱失败而最后遭遇着危机的时候，一切什么悲剧呀、同情呀、人道呀、自治呀、独立呀的叫喊，就象潮水冲破了闸门一样地泛滥起来了。由此可见，进行这种叫喊的人们，除了有一些是出于误会以外，根本是最反动的农奴制度和最野蛮的大农奴主的卫士，根本是西藏人民自由解放的敌人。也正因为这样，这个梅特涅式的反革命的“神圣同盟”才会把美国国务院、英国殖民主义者、南朝鲜李承晚、南越吴庭艳、中国蒋介石和印度的反动党派人民社会党、人民同盟联系在一起。这有什么奇怪呢？

我们感到惊异的是，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一方面显然跟这个同盟中的许多肮脏人物有重要的矛盾，懂得他们所玩弄的不利于印度、不利于中印友好、不利于尼赫鲁自己的阴谋诡计，另一方面却不由自主地被这个同盟推到他们的所谓“同情”西藏运动的重要地位，而让他们坐山观虎斗，拍手称快。我们现在被迫在自己的评论中同尼赫鲁先生有所争辩，这是我们非常难过的事。尼赫鲁先生是我们尊敬的友好邻邦印度的总理，是世界上有威望的政治家之一。对于我们来说，尤其不能忘记的是，他是一

位中国的友人，一位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反对者。而且，他对于社会进步，也曾经发表过不少开明的言论。例如，他在1934—1935年在狱中所写的“自传”一书中，尽管对共产主义表现很多误解和偏见（他自己也说，他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带着在资产阶级环境的“熏陶中所养成的一切偏见”），但是他仍然承认，由于用科学方法研究过去的历史和当前的时事，“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对今天世界上发生的变化做出了最精辟、最深刻的分析”。他并且说：“经济利益形成各团体和各阶级的政治观点。理智或道德的看法都不能超越这种利益。个人可以接受感化，可以放弃特殊的权利，虽然这是少有的事情，但阶级和团体却不会这样。因此，感化一个统治的特权阶级使它放弃它的权力和特权，这样的企图一直是失败的，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说将来能够成功。”尼赫鲁在这里说得很对。但是，他在1959年4月27日的讲话中却唱着一种多末不同的调子！他或者是完全抛弃了他以前发表过的见解，或者是实际上没有了解他所曾以为了解过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他现在责备我们没有能够感化统治西藏的特权阶级使它放弃权力和特权，而且企图把对于西藏社会的阶级分析作为“颇为陈腐的字眼、措辞和口号”一笔勾销，把极端对立的农奴和农奴主这样两个阶级，描写成为“担心可能会在改革的名义下对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一个单一的社会！当然，尼赫鲁的这个企图是我们所无法同意的。西藏社会的阶级对立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根本不是什么字眼、措辞、口号的问题，更谈不到什么陈腐。改革当然要采取行动，当然要有利于绝大多数要求改革的人，只是不利于极少数坚决反对改革的人。在西藏的情况下，改革首先就是要有利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一百十四万人。其余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六万人，这里面也有种种不同的情况。坚决反对改革、直至举行叛乱和

死不悔改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我们已经说过，两万左右的叛匪大部分是被裹胁欺骗的劳动人民（任何反革命军队都是如此），如果除去其中三分之一左右的康巴人，那么，参加叛乱的西藏人只占西藏一百二十万人的百分之一多一点。以为整个西藏上层阶级都叛变了的想法是不正确的。而且，在这六万人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赞成改革的开明人士。因此对于上层阶级也必须分别情况，适当对待，这是我们所一向坚持的政策。如果说，上面说的这些不同情况的人对于改革都是同样担心的，在心理上和感情上都是同样有障碍的，那是不合乎实际的。至于要求改革的绝大多数人，他们对于改革有什么要担心，有什么心理上感情上的障碍呢？

尼赫鲁在讨论西藏社会的时候，虽然并不反对改革，也不否认既得利益集团在叛乱中的作用，但是整个说来，他不但没有涉及这个社会的极端残酷的剥削制度，而且实际上把极大多数被剥削者和极少数剥削者混为一谈，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否认西藏叛乱要由少数上层反动分子负责，把中国人民平定叛乱的正义行动说成是“悲剧”，对于叛乱表示同情。这样，他就犯了一个极可惋惜的错误。作为印度的朋友，作为尼赫鲁所讨论的问题的当事人，我们认为，指出这个错误是必要的。如果同意尼赫鲁的逻辑，那么，不但西藏的革命是不能允许的，整个中国的革命也是不能允许的。大家记得，中国汉族地区在解放前虽然不是农奴制度，但是基本上也没有脱离封建社会的范围。这个社会也是一向被称为停滞不前的、没有变化的、与世隔绝的社会。有些人也曾经讥笑我们是从陈腐的、过时的、极端简单化的和完全不合国情的外来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断言我们的改革运动将受到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抵抗，甚至宣布我们是分裂民族，背叛祖国，是听命于莫斯科的所谓“赤色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等

等，等等。现在历史已经作出结论：正确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所有对于共产主义者的种种攻击和诽谤，一概都彻底地破产了。停滞不前的、没有变化的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一变而为生气勃勃、迅速前进的中国，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过去的停滞不前，不过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受到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束缚罢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真正代表着民族的利益和祖国的利益，而那一小撮自称为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反共分子，尽管也曾暂时迷惑过一部分群众，却真正被证明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我们相信，中国历史的这个结论，尼赫鲁总理也是不至于反对的。但是按照尼赫鲁在西藏问题上的逻辑，只要他的同情不仅仅限于“西藏人民”，而扩大到整个“中国人民”，那么，整个中国革命也就要变成令人百倍难过的空前的大“悲剧”了。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的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比西藏的两万左右叛匪多得多，说他们不止是“上层反动分子”的“理由”也多得多，战争的规模也大得多，总之，值得引起的“同情”也应该强烈得多。但是，据我们所知，尼赫鲁总理在同情整个中国的时候，并没有同情于汉族的“大农奴主”；而在同情中国的一部分——西藏的时候，却同情于西藏的“小蒋介石”。这种极端的矛盾，究竟令人如何理解呢？

尼赫鲁先生可能说我们不公正，因为他所讲的只限于西藏，而西藏人跟汉人是不同的。这就是说，汉人在西藏人中间领导革命，将不可避免地遇到民族的障碍。西藏人跟汉人不同，千真万确。不但如此，蒙古族人、维吾尔族人、僮族人、回族人、苗族人、朝鲜族人，以及中国的其他许多少数民族，也都跟汉人不同。在中国共产主义者和中国政府面前，存在着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我们是十分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的。我们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培养了各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并且在汉族人民中，特别是在汉族干

部、共产党的汉族党员和人民解放军的汉族官兵中，认真地进行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教育。我们采取了资本主义世界上没有先例的办法，在汉人占人口多数的民族杂居地区说服汉人，建立了少数民族的自治区。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一些自治州、自治县，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西藏，为了争取西藏上层分子的合作，我们用了特别大的耐心，在和平解放了八年之久的时间里，一直保存着原来的西藏地方政府，它的一套制度、它的军队甚至它的货币，一直说服西藏人民暂时不要进行他们所迫切要求的改革。如果中央人民政府象所谓达赖喇嘛声明所说，不给原西藏地方政府任何自治的权利，那么，那些叛国有据的反动分子早就会被逮捕惩处，西藏的民主改革也不会拖延到现在了。中央人民政府对那些反动分子采取了如此仁至义尽的态度，甚至在拉萨叛乱爆发以后，甚至在知道达赖喇嘛已经被劫出拉萨以后，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的部队还是一直等到叛匪向军区直接发动了武装攻击的七小时以后，才开始举行还击。很明显，到了这一步，反动分子已经把和平解决的路都堵死了，除了坚决讨伐和平定叛乱以外，任何其他办法都没有可能了。人民解放军既然有力量迅速平定拉萨地区的叛乱，如果它愿意先下手，当然早就可以把罗布林卡包围起来，使叛匪无法劫走达赖喇嘛。每个明白事理的人稍微想一想，都会懂得这个道理，而决不会去理睬什么两发炮弹打向宫殿、落入池塘的童话。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面对着这种严重局面，始终坚持不打第一枪的方针，正是说明了共产党人对待民族问题始终是很慎重的，对于争取西藏上层分子尤其尽了最大的努力。这种政策，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能认真执行，资产阶级或者其他剥削阶级就是想要这样作，也是作不到的。

在这里，在民族关系问题上，根本的关键仍然是阶级分析的

方法问题。尼赫鲁先生希望我们“争取他们友好合作”，这无疑是一个好的主意，虽然尼赫鲁先生的意思是为了间接地指责我们过去和现在没有这样作。事实上，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地正确地解决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民族之间的纠纷和隔阂，基本上是剥削阶级造成的，剥削阶级也永远不可能消除这种现象。但是各民族的劳动人民，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之下，完全能够通过一定的努力，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纠纷和隔阂，结成兄弟般的融洽的友谊。中国历史上有过长时期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斗争。蒙古统治者和满洲统治者压迫过汉人、维吾尔人和西藏人，而汉族统治者也压迫过蒙古人、满洲人、维吾尔人和西藏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占人口绝大多数并且是革命主力的汉人，现在仍然需要派遣一部分人员到内蒙古去，到新疆去，到西藏去。但是，现在不是去压迫和剥削那里的少数民族，而是跟当地民族的革命干部在一起，帮助那里的劳动人民从本民族的压迫者、剥削者手中获得自由和解放，实现民主和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建立使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繁荣昌盛起来的基础。在这些地区工作的共产主义的汉族人员，包括人民解放军的汉族官兵，不但没有骑在少数民族人民的头上摆威风，相反，他们是跟当地民族的革命干部一道，做少数民族人民的勤务员。他们常常不避艰险，同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同甘共苦，为他们的权利和幸福而斗争。这样，各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以及各少数民族的一切爱国的、赞成改革的上中层分子，就跟汉族的劳动人民联合一致，象汉族人民一样地推翻了他们本民族的上层反动分子的反动统治。这样，各民族的纠纷和隔阂的根源就消灭了，各民族的友好合作就获得了真正巩固的基础。这个过程，在内蒙古，在新疆，在西北的宁夏、甘肃、青海，在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

广西,都已经实现了。在这个过程中,领导改革的人员都竭力团结各少数民族的赞成改革的各阶层人士,在改革以前、改革中间和改革以后都跟他们保持密切的合作。诚然,不可能没有斗争,而四川、甘肃和青海的藏族地区还曾经发生了武装叛乱。但是,如我们在别的地方已经指出过的,这些藏族地区的叛乱,正是由西藏的反动分子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指使和煽动起来的。

在西藏,由于那里的大农奴主的统治在和平解放的过程中没有受到变动,他们仍然能够利用合法地位指挥保卫农奴制度的旧藏军、康巴叛匪和其他反动的政治机构,并且继续跟一些外国干涉者相勾结。因为这样,在那里不但没有进行改革,而且还能够发动这一次的叛乱。但是,即使如此,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以来,西藏人民仍然是屡次三番地热烈地要求改革。水深火热中的西藏人民所担心的不是改革,他们担心的倒是中央人民政府过于迁就西藏的大农奴主,而一年又一年地拖延改革!世界上的人道主义者诸君须知:西藏的农奴也是人,要他们相信那些无情地勒索他们、鞭打他们、挖出他们的眼睛的魔鬼是他们的保护人,是不可能的;要他们相信那些热诚地、和蔼地帮助他们劳动和治病、不取他们一针一线的解放军战士是他们的仇敌,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这次叛乱尽管打着民族旗号和宗教旗号,尽管有高山深沟的地形,尽管有各种名目的外国援助,却完全得不到西藏人民支持,转瞬之间就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根本原因。西藏人民对于平定叛乱的人民解放军收缴了封建政府的官印,收缴了叛匪的枪枝,收缴了农奴主的刑具“法鞭”,普遍感到久旱逢甘雨一般地高兴,这三样东西把他们压迫得太惨了!他们给解放军自动带路,自动报告匪情,自动协助捕捉残匪,搜查枪枝。只是在拉萨人民法院一处,就接收了群众自动收缴来的枪几百枝。在山南,许多村庄的居民听说解放军要来,马上聚集起来向战士献